

具史家胆识 含风骚神韵

——评易竹贤著《胡适传》

辛 之 勤

我国5、60年代的传记文学基本上属于“英雄传记”，到新时期则呈现出多元的发展势头，除“英雄传记”外，开始多有写普通人及历史上有争议的复杂人物的传记。一般而论，传记文学的价值与传主的人生价值和知名度不无关系，但又不能将这二者简单等同。“英雄传记”自然能从正面积极影响世道人心；而那些写普通人和复杂人物的传记，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多方位地考察人生的可能性，也许更能启迪人们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入思索。易竹贤同志的新著《胡适传》(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在传记文学多元发展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作品。

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诸种复杂矛盾所孕育出来的一个产儿。他一生涉足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以及社会政治等众多领域，蜚声遐迩，影响极其复杂。而且，这个本来复杂的人物后来又被人人为地复杂化了。大陆与台湾对他的评价并不一致。《胡适传》能为这样一个人物立传，正显示出作者的胆识。

面对本来复杂而又被复杂化了的胡适，这本传记的首要任务就是“辨真伪，明是非，定犹豫”，象传主生前常说的那样：“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传作者不被繁杂表象所困惑，不为既有定论所局限，一切以事实为准绳，力求据事直书，作一信史。即使该传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述及当时的书刊记载，作者仍要以审慎眼光重做一番甄别鉴定的工作。例如，关于胡适原名“嗣康”非“嗣廉”的考证，即可见作者治学谨严之一斑。又如长期以来，“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已经成了批评胡适的重要根据，然而，作者遍查胡适的著作、言论，证明他一生并未说过这种反科学的话，因而传记中不予采用。至于胡适晚年亡命美国，辗转台湾的十几年，既因其政治上反对人民中国，学术上少有作为，又因海峡两岸隔绝，史料难于考索，也就宁信而从简了。而且，《胡适传》在对传主生平的叙述与辨析过程中，时有作者的独到的见解。例如，胡适在30年代发表了一篇5万字长文《说儒》，给予历史上的孔子以很高的评价。对于曾以“打倒孔家店”而“暴得大名”者的这篇文章，台湾一些研究者多感困惑，有的以此文来否定五四时期胡适的反孔思想，有的则指责他前后自相矛盾，又都难以自圆其说。胡适本人竟也堕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胡适传》作者通过深思熟虑的研究，指出，他们是把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孔子与打倒“孔家店”中偶像混为一谈了。五四时期胡适与许多新文化战士一道“打孔家店”，反对偶像的孔子，于思想解放有大功绩；《说儒》则是对历史的孔子作客观评价，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应该说，将这二者区别开来是很有见地的。它不仅可解除海峡那边人们的困惑，而且阐明了现代文化思想史(包括文学史)上一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过去不少人习以对孔子作历史评价的尺度去看待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那场运动，总不免觉得那时的做法有悖于历史真实和科学精神。现在将这二者区别开来，人们就不再有这种遗憾的感觉了。传中象这样一些真知灼见，显示了作者思想的深刻及其所具备的穿透力。

读《胡适传》，让人感到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把胡适当作一个悲剧人物看待，考察了他的人生悲剧的内容及其根源，并对此进行了评判。该传表明，胡适的婚姻就带有悲剧性。他年轻留美时，曾先后对美国女郎韦莲司和留美才女陈衡哲有过很深的情意，但他终于不违母命，娶了一位旧式的小脚女人，这无疑是一种悲剧意义的结合。作者对这位新人物未能冲破旧伦理旧礼教的束缚，理智上持否定态度；但从东方人的道德观念出发，对他名满天下而不毁旧约的品行，又有某种感情的认同和事实的肯定。这种悲剧意识也表现在对胡适学术事业的评述上。作者高度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小说考证等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在白话诗文的倡导和创作方面，在教学方面，都走了一条“划时代的”、

“开拓性的新路”，但又不无惋惜地指出，胡适未能与时俱进，却反而愈到后来愈鲜见精采。他所留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和《四十自述》等几种著作，都是前半生未完待续的“半部书”。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与他误入政治的“歧路”相关。作为一个书生，政治并非他所擅长，然而他终于被卷进政治的漩涡，以至拘限、扼杀了他那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生命，这不能不使人为之怅然。然而，《胡适传》最能引起人们深长思索的，是写出了胡适一生追求与幻灭的悲剧。五四时期，他曾以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新月”时代又大唱人权与法治，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晚年虽然处境凄凉，仍勉力支持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终于因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而引起致命的围攻，真可以说是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执着不懈，态度也不可谓不虔诚；然而他的理想最终破灭，只能带着幻灭的悲哀，长眠在那孤岛之上。作者把胡适的悲剧不仅视为他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看作是时代的悲剧。在那军阀横行、武人专制的旧中国，加上民族危机，外患频仍，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固然美妙却是无法实现的；胡适却为执拗地追求那时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往往把民主与科学的希望寄托在与民主、科学绝不相容的独裁专制者身上，幻想他们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这正是胡适一生悲剧的深刻根源之所在。该传通过胡适由走在时代前面“首举义旗的急先锋”，变为时代落伍者的人生悲剧，雄辩地证明他所走过的那条道路是一条无法行通的错误道路。这是贯穿整个传记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作者回顾胡适一生所归结出的一条重要的人生教训。

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传记文学的一个基本观念：优秀的传记文学应当是史与诗的高度统一。文学性，也正是《胡适传》所追求的另一目标。传作者以人为本位，笔锋常带感情，“传其神，写其心”（清王源语），领有风骚韵致。作者写胡适不违母命娶一小脚女人为妻时，如实表现了他对这种无爱的旧式婚姻的内心不满，同时，又写他为了博得母亲的高兴，强以闺房之爱的外表掩饰无爱的内心，由此也就展示了胡适心灵深处难以言说的矛盾、凄苦。我们也因此感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在胡适内心搏击的情景。胡适晚年当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作者又透过他宴饮演讲，答谢应酬的热闹表象，看到他晚年的孤寂，心境的凄凉，这又使我们触摸到他理想破灭时的真实心理。作者不仅关注传主的经历、思想等外在层面，而且深入到了人的内心世界。唯其如此，该传为读者提供了胡适“这一个”独特复杂的个性。它使我们看到，胡适一生有软弱动摇的特点，却也时有激烈勇敢之举。他首倡文学革命，勇敢攻打“孔家店”，同时与旧势力往往过于周旋，显得犹豫而妥协。他敢于批评孙中山，大谈人权，甚至直接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可后来又胆怯怕事，“抛却人权说王权”。胡适喜欢演讲出风头，爱热闹，乐受恭维，超前使用博士头衔达十年之久，确有“好名太甚”的虚荣心。然而他又有谦虚、诚实的另一面，如先后请“众手增删”《尝试集》，公开承认自己对《水浒》古本考证的错误等，又表现出一个学人的真诚。胡适颇具儒雅风度，有较为宽厚的心胸。当苏雪林漫骂逝世不久的鲁迅时，他内心也不满于鲁迅生前对他的批评、指斥，然而并不赞成苏氏的“恶腔调”，主张客观持平论人，他是很讲个人修养的人。作者写人，“善恶并举”，“美丑并存”，我们从传记中，正感受到一个复杂的鲜活生命的存在，这是该传艺术上成功的一个主要标志。

《胡适传》体制也颇有特色。有关胡适的资料丰富，内容极为驳杂，作者将各种可资参证的史料，异闻掌故，及疑阙备考诸项移入注文里，这样就避免了正文过于繁复沉闷，使全书内容既丰厚充实又脉络清晰，精干凝炼，这种“博而能约”的特点，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能各取所需，雅俗共赏。全书结构“虽云长篇”又“颇同短制”。从胡适一生中挑出较有意义或较有趣的七十二个题目，写成七十二节短文，每节主旨集中，自成一体，有起伏高潮和各自的魅力，但又断而能续，与前后各节纵横沟通，构成一个有机的总体。这也许是想在传记文学上走一条新路罢。

人们对人生、社会的认识、理解是一个不断的深入发展过程。因此，休·凯纳说“不存在任何‘定案权威性’的传记”。《胡适传》当然也不是这样的传记，它也有可吹毛求疵之处。如该传对胡适终生影响最大的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评价及其与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异同之处，似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分析和辨别。又如《附记》中，作者指出：胡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同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文明相交混而哺育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的学者”。这种对胡适的盖棺定论似觉简单、严厉了一些。胡适身上虽有很深的民族旧有传统的烙印，但是“旧的”、“传统的”东西并不都是封建主义的。也即是说，胡适从本民族吸取的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不然，何以解释他终生不渝地追求、信奉民主与自由呢？我们期待再版的《胡适传》更趋完善。